



□ 孔祥安

“慎”的五个方位

慎，就是小心、谨慎、慎重的意思。它不是犹豫不决、畏首畏尾，而是一种道德修养、道德自律。它要求一个人知敬畏、守道义，做事谨慎、严格自律。对领导干部来说，慎是一种理性的戒惧与自警，是一种必备的修养与境界。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议题。慎常常被看作是一种道德素养，一般会与人的思想行为联系在一起。

一是慎独。所谓慎独，就是指一个人在独处、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坚守道义，小心谨慎，严格约束自己，自觉遵守道德和法律，做到诚实不欺、表里如一、洁身自好、守身如玉。儒家将慎独作为自我修养的重要方法，作为检验一个人道德素养的标准与试金石，要求为政君子具有“慎其独”的道德修养与人生境界。如《礼记·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儒家希望道德高尚的君子始终保持“慎独”之心，要求为政者必须具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政治自觉，即使在自己不被他人所闻所见之处，也必须时刻坚守道义，不放纵自己，不逾越规矩。古代许多士大夫与知识分子十分推崇与提倡慎独，如东汉“四知”先生杨震，以“暮夜却金”的行为典型诠释了慎独之修养。

二是慎言。所谓慎言，就是谨慎地说话、讲话，说真话、讲实话，说有益的话，做得到的话，不说做不到的话，特别是不说假话、大话、空话。儒家提倡“慎言”，不是沉默不语，不是夸夸其谈、高谈阔论，更不

是口无遮拦、随便乱说，而是要求君子或为政者“非礼勿言”“循礼而言”，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言忠信”，不花言巧语、巧言乱德。在孔子看来，花言巧语的人往往面目伪善、很少有仁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时常用一些迎合、奉承、欺骗的话语“忽悠”人、迷惑人，说一套做一套。儒家要求君子尤其是为政者对待言语要谨慎，如孔子告诫为政者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在借古人轻易许诺，告诫为政者不要多言，慎重对待言语，否则，如果说没有做到，就会失去民众的信赖。

三是慎微。所谓慎微，是指慎重对待事情的细微、细小和细节，避免因小失大。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是从细微、细小处一步一步发展变化过来的。古今凡有作为者，无不始于慎微，成于慎微。《资治通鉴》说：“尽小者大，慎微者著。”《淮南子·人间训》说：“圣人敬小慎微，动不失时。”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细节决定成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注意小节，注重点点滴滴。如，荀子在《劝学篇》中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也是一个不断积小善、去小恶的过程。又如，《易传·系辞下》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小善、微善不积，就无法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小恶、微恶不去，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堤溃蚁穴，气泄针芒”说的就是这个道

理。做人是这样，治国理政更应谨小慎微，“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微，莫不如此”。《吕氏春秋·察微》说：“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一个细小事件很有可能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存亡，为政者应该谨慎对待，不可麻痹大意。祸患往往始于微小，只有谨慎关注事态的微小变化，并对其发展趋势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及时的预测，谨慎认真对待，才能避免祸患的发生。

四是慎始。所谓慎始，就是谨慎对待做人做事的初始、开始，端正动机与出发点，把好第一次、第一关，守住做人做事的原则底线。《礼记·经解》说：“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儒家认为，如果开始不慎重对待、做不好，一旦出现偏差，往往会一错再错，结果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慎始，尤其要为政者做到慎始。汉代贾谊说：“君子慎始。”北宋苏洵《上文丞相书》讲：“君子慎始而无后忧。”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头三脚难踢。”“良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这些都是在提醒人们慎重、谨慎地对待事情的起始。慎始事关大局，必须谨慎对待。只有不忘初心，才会方得始终，否则，心存侥幸，走错第一步，结果会越走越远，乃至步入犯罪的深渊，悔之晚矣。如，明代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讲了一个故事：张瀚初见长官王廷相时，王廷相说昨天进城遇到大雨，一个轿夫穿了双新鞋，开始轿夫怕弄脏鞋总是择地而行，后来轿夫一不小心跌进泥水之中，就不再因顾忌自己的新鞋择地而行了。这个历史故事告诉

我们，人一旦“踩进泥水坑”，心里往往就放松了戒备，在惯性的支配下，从此便“不复顾惜”了。

五是慎终。善始不易，慎终更难。始是万事之开端，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终是事情的结果，是功成名就的圆满句号。所谓慎终，就是慎重地对待人生或事情的结束、结尾、结果，让人生或事情从头到尾有一个圆满的终结、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做到善始善终、有始有终，不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一般来说，一个人往往能够慎重地对待做人或做事的开始、开头，注重人生规划与事情谋划，但常常做不到持之以恒，经常是不了了之，半途而废，功败垂成。古人云：“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事实也告诉我们，往往是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问题，所以很注意慎终的问题。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又如，汉代刘向说：“慎终如始，常以为戒。”这些都是在强调对待结果要像对待开始一样慎重，不可鲁莽、草率。泰山半山腰有一段平路叫“快活三里”，这段路相对平阔一些，游人爬山累了，喜欢在此歇脚。挑山工一般不在此久留，而是选择继续前行。他们知道停留时间长了，腿就会“发懒”，上“十八盘”就更困难了。



海源阁：四代藏书 百代流芳

□ 陈勤娜

在山东聊城西南隅的杨氏宅院内，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坐落在一片绿荫红花之中。海源阁为三间硬山脊南向二层楼阁，飞檐画角、青砖灰瓦、红漆梁柱，看上去古色古香。主楼正中挂着“海源阁”匾额，一楼正中两侧门柱上挂着创始人杨以增的对联：“食葍四时新俎豆，书藏万卷小琅嬛”。在展厅中另有一块“海源阁”匾额，跋语曰：“先大夫欲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事并籍藏书，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亦仿鄞范氏之以‘天一’名阁云。”海源阁由此得名。

海源阁之名，既寄寓了创始人的治学思想，又体现了其藏书特色。《礼记·学记》云：“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讲君子治学必务其本，“海源”之名，寄寓了追远之思，模仿著名藏书楼范氏天一阁做法取名为“阁”。此外，“海”指收藏如海般广博，门类众多无所不包，不为一般藏书家所重视的医药、堪舆、小说、戏曲等类书籍也尽力搜求，如明高丽本《东医宝鉴》、明本《西厢记》等，搜罗之宏富可见一斑；“源”表现在版本上崇尚宋元古刻、名家校抄，内容上注重经史子集的原典文献，珍藏的宋版“四经四史”为镇阁之宝。

海源阁以其藏书精善广博，被誉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自宋至清，私家藏书以江南一带为盛，清末四大藏书楼中，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吴兴的皕宋楼、浙江杭州的八千卷楼都居于江浙，唯有海源阁崛起于北方。又因藏宋元珍本之多，与瞿氏铁琴铜剑楼并称“南瞿北杨”。杨家四代人前后相继，百余年致力于精品图书的搜集、保管与整理，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胡乔木评曰：“一人致力万人受惠，四代藏书

百代流芳。”海源阁藏书在我国外交史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72年毛泽东赠送给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的《楚辞集注》，就是海源阁藏书的影印本。

海源阁创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代藏主杨以增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父杨兆煜曾为即墨县（今山东青岛即墨区）教谕，生平喜爱诗词创作，博学通经，为治学而多方求书。杨以增，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先后在贵州、河南、甘肃、陕西、江苏等地做官。受其父影响，在各地任职期间广购书籍。杨以增藏书始于贵州为官时，任河南道员时开始收藏善本，而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任江南河道总督后达到高峰。江南河道总督官署设于清江浦，靠近太平天国与清军交战区域，容易购得因兵祸散出的江南许多私家藏书。杨以增性情豪爽，正直坦荡，交游甚广，其挚友陈官俊概括其品行曰“公、忠、正、厚”，至交林则徐赠言“学有经法，通知时务，行无瑕尤，直到古人”。诸多友朋和书商素知以增嗜好古籍，故多有寄赠或登门洽谈，海源阁所藏“四经四史”以及子集善本大都在此时获得，奠定了数十万卷的图书收藏基础。

第二代藏主杨绍和是杨以增次子，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曾任右赞善、翰林院编修、通议大夫，赠于文辞且文法精密，著有《仪晋观堂诗抄》一卷颇得好评。绍和颇慕陶渊明，爱其高洁品格，作《对菊偶成》四首，其一云：“偶从陶令问前身，微笑拈花悟夙因。寂寞疏窗无个事，一镫如对古诗人。”其二云：“萧斋兀坐即深山，风雨重阳好闭关。不是此花偏耐冷，要留傲骨在人间。”杨氏追慕陶诗，尽心尽力收藏陶集各本，现存的四种宋本陶集，海源阁就搜得到三种，绍和甚至还将其室命名为“四陶

居”。绍和长期在京做官，不断在京都厂肆购入其他藏家的善本，辛酉政变后清宗室怡亲王府被查抄，怡亲王府巨量藏书散出，绍和购得其中明刊宋元人集及各子书善本百余种。杨氏藏书在绍和的努力下得到了进一步扩展。

杨氏藏书到第三代杨保彝时转向谨慎守护为主，零星购书补充。保彝为清末举人，曾以祖荫在京服官，后自请回籍归隐，经世道之离乱，知护书之益艰，对先人收藏深自秘惜、不轻易示人。保彝无子，恐身后族人争夺产业致藏书离散，曾呈官府备案，可谓煞费苦心。海源阁在杨氏三代人不懈的努力下，奠基于杨以增，扩展于杨绍和，补充于杨保彝，辗转全国各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历数十年终成清末北方最大的私家藏书楼。

第四代藏主杨敬夫原名承训，保彝无子，以族子敬夫为嗣。保彝卒时敬夫尚幼，保彝妻王少珊主持家政，逢军閥混战，少珊为保护图书付出了巨大努力。敬夫赶上政局动荡，军閥混战，海源阁迭遭损失，敬夫为尽量保存旧藏，先将聊城部分宋元珍本移往天津，后又将部分残存书籍运往济南杨氏新居，还有一部分运往聊城西南的弘农丙舍。家国之靖文化遭殃，在战乱年代私家藏书的散失概不可免，敬夫不失时机地三次转移是明智之举，使得海源阁虽不复旧貌，但所藏的部分善本却得以留存，如今散藏在国家图书馆、山东图书馆、台北图书馆等处。

收书不易，藏书更难，杨氏几代人对于图书的管理与保护更是费尽心思。杨氏藏书分作聊城杨宅旧居、聊城西南弘农丙舍和肥城陶南山馆三处，一旦遇乱可减少损失且方便转移。杨氏购得善本书后均重加装潢，书外装锦函，以楠木匣盛放，若原书有前任藏书家书匣则保持不变。海源

阁地基抬高，有窗以便通风除潮。阁前有专门的晒书亭，根据当地气候特点，每年在清明节至立夏期间，空气干燥且阳光温和时晒书和开窗通风，因此间气候干燥阳光温和。院里有水井两口用来防火。杨氏对书籍无微不至的保护，至后人阅其藏书时，内页仍手泽如新。

海源阁藏书管理极严，家里仆从一向不准登楼，有服役数十年不曾一瞻阁上书籍者。友朋除非契交也一概不准登阁观书，更别提外借。家主在年幼不懂书的时候禁止接触家藏善本，以防作践损毁。杨氏藏书在建筑、存放、装潢、检视、修补等多方面都极为严格，虽有保守之嫌，但确有保存之效。古代私人藏书往往旋得旋失，历三代递藏者，除铁琴铜剑楼和天一阁外，唯有海源阁一家。

海源阁不惟收藏宏富精善，也勤于对藏书的整理研究，杨氏编有目录五种，有善本解题目录《楹书隅录》初续编九卷、简目《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海源阁藏书目》和《海源阁书目》，大多按经史子集四部依次著录，正文中又根据版本时代及精善程度不同，分别以宋本、元本、校本、抄本四种版本依次著录。海源阁为了嘉惠士林，利用自己的珍藏佳本，刻印图书的数量和质量都成绩斐然，其功卓著。杨氏刻书不像书贾出于商业目的，而更多是以传世为己任，以治学为先，校勘精审，为保留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诫伯禽书》的作者是周公。周公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100年，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武王东伐纣王，并制礼作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位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周公历经文王、武王、成王三代，既是创建西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又是稳定西周王朝、促使“成康之治”的主要决策人。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后，把周公封在了鲁地，但周公因为辅佐朝政，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代为就位。伯禽是周公长子，鲁国第一任国君。《诫伯禽书》就是在伯禽去封地之前，周公告诫儿子的一段话，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开中国古代仕宦家训的先河，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成文家训”。

《诫伯禽书》写道：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君子力如牛，不与马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智如士，不与士争智。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文多记而守以浅者，广。去矣，其毋以鲁国骄士矣！

这段话用现在的语言表达就是：有德行的人不怠慢他的亲戚，不让大臣抱怨没被任用。老臣故人没有发生严重过失，就不要抛弃他。不要对某一求全责备。有德行的人即使力大如牛，也不会与牛竞争力的大小；即使飞跑如马，也不会与马竞争速度的快慢；即使智慧如士，也不会与士竞争智力高下。德行广大者以谦恭的态度自处，便会得到荣耀；土地广阔富饶，用节俭的方式生活，便会永远平安；官高位尊而用卑微的方式自律，便更显尊贵；兵多人众而用畏怯的心理坚守，就必然胜利；聪明睿智而用愚陋的态度处世，将获益良多；博闻强记而用肤浅自谦，将见识更广。上任去吧，不要因为鲁国的条件优越而对士骄傲啊！

从这部家训，既能看出周公对儿子的谆谆教诲，更能体悟出他的为官品德。

周公为政的第一大官德就是礼贤下士、尊重人才。周公曾为见贤人而“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建设国家，恢复生产，制定国家发展规划，制作礼乐制度，镇压反周势力，消除周边隐患，安抚商朝遗老，等等，可谓政务繁忙、日理万机。就连洗澡都有人打搅，古时候男人头发长，周公握着湿头发从浴室跑出来，接见完了，又回去接着洗，以致反复多次。至于吃饭，周公也在处理政务，吃一口饭，不等嚼完又得吐出来，因为又有客人来求见了，所以一饭三吐哺。后世一些有志向的政治家，也以周公的精神勉励自己。如曹操在《短歌行》中有一句我们都很熟悉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就是以学习周公的精神，抒发自己思贤若渴的心情。

周公为政的第二个大德就是谦虚谨慎、谨言慎行。谨言慎行是指言语行动要小心谨慎。立言当慎，不仅仅是威严所系，更重要的是关乎社会成本。《礼记》中记载：“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蔽；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这句话的意思是，政令的实施，要考虑时机是否成熟，是政令在必行，如果是涉及全局的政令要小心慎重地出台。如果朝令夕改，一定会引起社会运行机制和运行轨道的改变以及老百姓的行为和心理的调整，特别是转换和调适的过程，通常都要付出

《诫伯禽书》：中国第一部成文家训

□ 王杰

一定的社会成本。古人说，口乃心之门户。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莫之为甚。一句不当，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也就是晋朝傅玄《口铭》中的“祸从口出”，意思是灾祸从口里产生出来，指说话不谨慎容易惹祸。《庄子》云：“言者，风波也。”一个人说话要特别注意，有时一句话是双刃刀，害自己也害别人，曾有长舌不能说，人有短舌不该说，你以为自己能说会道，巧舌如簧，其实倒霉的事很多就是从自己的嘴里引出来的。中国历史上有太多血淋淋的故事告诉我们“祸从口出”的代价。

周公对侄子成王、儿子伯禽的谆谆教诲，其目的是让他们务必养成勤政爱民、谦虚谨慎、自爱自律、礼遇贤才的为政品质。《尚书·无逸》记载，周公教导成王勤俭执政时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穡之艰难。”这句话后来成为诸多帝王用来教育子孙后代做人不要贪图安逸享乐、骄奢淫逸的名训。周公特别强调为政要修己敬德，杜绝骄奢淫逸，以免重蹈殷商因为失德而亡国的覆辙。周公对国之隐忧认识得很深刻，他认为国家真正的隐患不在于当前而在于后嗣。因此，他对成王的教育非常重视，这种教育既包括治国理政等能力的培养，也包括个人思想道德品格的塑造。在周公的悉心教育下，周成王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一代明君。而伯禽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盼，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鲁国治理成了闻名遐迩的礼仪之邦，那里务本重农、民风淳朴、崇敬敬学，令人向往。

